

## ● 书 评

## 重利·扬名显亲·中国的资本主义

· 刘永华 ·

“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类似于西方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为何未能在中国出现？”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克斯·韦伯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西方的资本主义之所以得以出现和发展，乃是因为新教伦理为之提供了文化因素和道德动力；中国之所以未能出现类似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则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因素和理性的资本主义格格不入。它们的互证，构成了韦伯多卷本比较宗教社会学论著的中心议题。对前一个问题进行讨论的，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而对后一个问题进行讨论的，是《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

韦伯诠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各个文明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宗教形态联系起来，考察相应的文化中是否具有适合资本主义精神生长的文化因素和道德动力。这就是“韦伯命题”。事实上，近十年来对韦伯理论的讨论，基本上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的。

有相当一段时间，韦伯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讨论为学术界广泛接受，成为分析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的基本理论。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地区日本经济的腾飞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人们开始对韦

伯的理论提出怀疑。面对战后日本创造的“经济奇迹”，学者们当然要问：“为什么日本可以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工业化，而中国却办不到？”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充分展现其经济活力时，学者们讨论的焦点是“为什么中国人也能发展出现代化的工业文明？”至此，对于韦伯的理论才有了全新的评价。

首先，在1985年11月召开的“美国中国研究学会”年会上，耶鲁大学的费景汉教授发表了题为《传统中国文化价值和现代化经济发展之关系》(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Values)的论文，作者以Simon Kuznets教授的“转换过程”为理论构架，讨论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文化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和“理性的平均主义”对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功用。他认为，这三项乃是造成战后东亚地区经济奇迹的文化因素<sup>①</sup>。这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条件方面对韦伯理论的一种诘难。

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讨论引向深入的是余英时教授，他在1986年冬季出版的《知识分子》(二卷三期)上发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sup>②</sup>。他仿照“韦伯命题”，将研究集中于被韦伯认为无法孕育出资本主义的文化土壤——中国的儒、道、释三教上

● 刘永华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他指出,在《百丈清规》和《禅苑清规》中,人们可看到儒教和道教入世修行的态度;而在宋明理学中,对勤劳做事(敬贯动静)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调可与加尔文教派的“选民前定论”相匹配;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为商人广泛接受,从而使得近世商人精神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众多相似之处。

费景汉教授和余英时教授对于韦伯理论的诘难,都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文化因子,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经济发展,可以发挥积极的正面作用。但某些论点似可商榷:一,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是十九世纪欧洲新教徒奉行不渝的日常生活准则,他们不是出家僧侣,而是在家俗人,而新禅宗和新道教均属出家宗教,他们如何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二,韦伯命题的根本要点,在于强调“选民前定论”对加尔文派教徒所产生的心理压力,迫使这一派的信徒汲汲营营于世俗的事功,以期证明自己确是上帝的选民。在两位教授的论著中却忽略了这一重要问题。三,“三教合一”和勤俭观念均形成于唐代或唐以前,不待新三教(新禅宗、新道教和新儒教)之出而形成。最后,假如如两位教授所说,中国古代已具有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为何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呢?在这方面,他们没有给我们满意的答案。总之,两位教授虽然仿照韦伯命题讨论了中国文化,但却忽略了中西社会文化结构的差别,将讨论的重心放到宗教领域。正是在这点上,宋光宇教授的新著《宗教与社会》<sup>③</sup>为我们提供了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发展之关系的一个新视角。

宋光宇教授的观点,可以用“重利”和“显亲”四字概括。“重利”,是对利润的追求,是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因素。在韦伯的理论中,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首要特征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一要项<sup>④</sup>。余英时教授从中国宗教中去寻找这一伦理,而宋

氏则将眼光投向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具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以闽南人向外开拓为例。闽南人向海外开拓的动机是什么?传统说法认为是闽南地狭人稠的结果,而美国的 Evelyn S. Rawski 教授在研究明末福建和十八世纪湖南的商业活动时,则发现闽南人外出从事远洋贸易是因为有利可图之故<sup>⑤</sup>。宋氏对十七世纪闽南人从事海上贸易和十九世纪开拓台湾历史的分析表明,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二、三百年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历了新产品的引进和开发、外资的介入、本地商人的跟进、国际贸易网络的建立、专业区的设立、女工的介入以及长年的贸易顺差等特征。宋教授认为,这一传统实际上为二十世纪的台湾所继承,成为促成台湾经济起飞的重要文化因素之一。将这种“自十六至十七世纪的闽南人海贸经验,跟十九、二十世纪的台湾人从事国际贸易的经验相比照,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有许多近似之处”。因此,作者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十六至十八世纪闽南人的海贸经验的确是今天台湾经验的历史文化源头”。

如果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重利”文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文化条件,那么,“显亲”或“扬名显亲”(出自《孝经》),则为之提供了道德的原动力。在西方,这种道德的动力来自上帝,而中国则来自祖先。宋光宇教授认为,这种不同,正反映了中国与欧美在社会结构方面的显著差别。在欧洲,经过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个人取得直接面对上帝(而不是通过层层控制的教会组织)从事礼拜和忏悔的权力,这种强调个人的观念逐渐成为“个人主义”。“在个人主义的笼罩下,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独立的个体,都能直接面对上帝,家庭组织也就不是非常重要,人与人之间是靠法律和契约来维系彼此的关系,也依据法律和契约来组成各种社会群体。基督教教义则成为西方社会的伦理与道德的基础。在十九世纪,

工业革命发生,随之而来的是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于是乎,从事科技发明、拥有优异的技术、从事制造和销售商品,以及金融业务等活动,就成了近两百年来欧美人士所重视和赞赏的,并以此来衡量品评一个人事业成就的高下。这就是欧美社会升迁管道和社会评价标准之所在。韦伯是以新教伦理,特别是喀加文教派所提出的教义,来解释十九世纪末叶的重商现象。由此,韦伯导出了结论:新教伦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第 390 页)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人是以‘家族’为社会结构的基础,个人相对的变得不重要。个人(主要是指男人)的天职就是要维系住家族传承于不坠。在生物性方面,一定要有儿子。在社会文化方面,则是要保持既有的名声和祖宗遗留下来的产业,若能发扬光大,凭自己的事功和科举功名来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做到‘扬名显亲’,就成为社会大众所称赞的对象。”(第 391 页)

基于这种认识,宋光宇教授和余英时教授产生很大分歧。宋教授敏锐地指出,当我们依仿韦伯命题讨论促成台湾经济起飞(其实也包括近年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的社会、文化、伦理因素时,“并不是要直接套用现成的韦伯定律和韦伯所说的‘金科玉律’,而是要依仿韦伯对十九世纪欧洲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宗教伦理等方面的广泛涉猎,来探索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相同部位的彼此运作情形。而后,再看看是不是有能导出与韦伯命题相对等的‘中国命题’”(第 390 页)。这一“相同部位”(counterpart)是什么?按宋教授的意见,不是上帝,而是祖先;不是宗教,而是家族;不是“荣耀上帝”,而是“扬名显亲”。其证据在明清两代的善书、家训中俯拾皆是。进一步说,如果韦伯所谈的新教伦理,可以化约成这样一个命题:“如何去荣耀上帝,以求救赎?”那么,根据明清家训和善书中反映出的

中国理想人格和相关伦理,可以化约出如此的一个命题:“如何去荣耀祖宗,以求得在家族中不朽的地位?”(第 389—390 页)

如此说来,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文化因素和道德动力,那么,为什么当时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文明呢?宋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假说。他认为,这是由于当时的科举制度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两个互为因果的制度和观念“使得中国社会升降流动管道只限于‘读书—考试—作官’这单一途径”(第 391 页)。只是由于近几十年的发展,多轨流动取代了单轨流动,士、农、工、商不再有高下之别,这套机制才发挥作用,创造出今日台湾的工业文明。

说到本书的不足之处,首先是在讨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传统时,希望作者能提供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资料以证明他们的重利观念;再者,“重利”和“显亲”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希望作者能有更清晰的交代。不过,我们也许不应对此书苛求太多,因为,宋光宇教授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诠释主要不是给我们一个最后的最圆满的答案,重要的是,他为我们讨论这一论题指出了新方向,提出了新问题。在这方面,他是功不可没的。仅此一点,我们便值得为此书鼓掌喝彩。

① 费景汉:《传统中国文化价值和现代经济发展之关系》,《九州学刊》1(1)[1986]:123—136。

② 该文收入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③ 宋光宇:《宗教与社会》,台北,东大图书公司,民国八十四年。

④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37 页。

⑤ Evelyn S. Rawski,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in South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